

任继愈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國藏書樓

任继愈署簽

貳



第六章

明代的藏书

第一节 明代藏书概述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虽然出身贫苦，用战争夺取了元朝的天下，但他对文化却有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徐继登《典故纪闻》卷一）。他说：“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黄佐《南雍志》卷一）他主张聘请知识渊博的人当老师，“俾勋贤之子弟，凡民之俊秀，莫不从学”（《南雍志》卷二十二）。正因为朱元璋有这样的认识，极大地影响了以后的诸个皇帝，使明代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永乐十八年（1420），南京的国子监有学生9 000余人，这在以前历

代是少有的(柳诒徵《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太学》)。各地的郡学、县学也普遍建立,“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明史》卷六十九)。明朝沿袭了唐宋的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读书风气。朱元璋对图书典籍很重视,“命有司博求古今书籍”(《明会要》卷二六)。明代朝廷在奖励大臣以及在分封藩王时,有时采取一种特殊的举措,即赠送书籍,此举很有影响力,极大地影响了明代的藏书事业。明代的出版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内府、中央各官署、藩王、地方政府、各种教育机构、私人、书坊都在从事刻书事业,刻书地域空前广阔,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出版技术、装订技术也有很大发展,出现了套版、饾版、拱花、各种活字的印刷技术。装帧形式普遍采用包背装,这种形式比起过去的蝴蝶装、经折装来更简单适用。总之,明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为藏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朱明王朝统治中国270余年,战争较少,社会相对稳定,再加上有利于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各种政策,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使明代的经济有很大发展,甚至明末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尤其是江浙地区,比其他地区更为繁荣,张瀚《松窗梦语》卷四曾有这样的描述:“沿大江而下为金陵,……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奢侈者,争趣放之。……浙江嘉禾边海,东有鱼盐之饶;吴兴边湖,西有五湖之利,杭州其都会也。……米资于北,薪资于南,其地实啬而文侈,然而桑麻遍野,茧丝绵苧之所出,四方皆取给焉。”明代经济的发展,为

藏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明代的小说、戏曲等比较通俗的文学体裁在宋元两代的基础上有飞跃的发展，《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闻名于世的古代通俗小说都形成或产生于明代，戏曲在元代杂剧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传奇。戏曲、小说因为它们通俗，写的是人民大众的生活，又带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性，虽然深持道统的封建文人不敢或不屑言及，但人民大众尤其是城市中的市民阶层是喜爱它们的，既然喜爱，就必然有人收藏。可以说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扩大了藏书家的收藏范围。今天之所以还得以看到明代产生的戏曲、小说，就是因为当时有人收藏，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版它们。

由于有很好的文化氛围，较为富裕的社会经济条件，喜欢藏书的队伍在扩大，使明代的藏书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一、藏书规模超过前代

明代的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其规模均大大超过前代，这固然与图书增多有关，但关键还在于整个社会对藏书的重视和整个社会经济实力的增强。仅以官府藏书和私人藏书为例。

明代中央政府藏书十分丰富，杨士奇编的《文渊阁书目》著录的7294种书是一例证，《永乐大典》的编纂也是一个例证。编纂《永乐大典》所抄录的图书，有人估计有七八千种之多，大大超过了唐宋时编纂的《北唐书抄》、《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多种类书所根据的图书的数量，而且是在四五年之内编成的，主要利用的是内府藏书。我们可以推断，这七八千

种书不会是当时内府藏书的全部，全部当近万种。当时存世的图书品种总量，今天已无法准确地统计，但根据清乾隆时为编《四库全书》向全国征集遗书的数量推算，当时内府藏书总量已占社会存书的绝大部分。在没有呈缴本制度的情况下，拥有如此丰富的藏书，今人不能不为之惊叹。

明代有许多收藏丰富的藏书家，如范钦天一阁，藏书最多时达 70 000 多卷，又如祁承燦澹生堂，藏书达 9 000 多种，又如黄居中、黄虞稷父子的千顷堂，藏书达 80 000 余卷，而且多为明代人著述。上述三位藏书家的藏书数量是有书目可据的，是真实的，没有水分的，不同于只有文字记载缺乏书目根据的明代及明代以前诸多号称万卷或几万卷的藏书家。

二、藏书地域不平衡

明代的私人藏书在地域上分布相当不平衡。北方地区少，南方地区多，且南方地区集中在江浙一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江南地区文化发达。历代的状元以江南地区为多便是最好的说明。江南地区良好的文化氛围，使士子们在科举制度下更容易获得加官晋爵的机会。通过充当各地的官僚，往往能获得较多的藏书。二是江浙地区经济繁盛，藏书家有足够资金用于藏书。有些藏书家是世代积累的财富，有足够财力用于藏书活动。三是江浙地区有浓厚的藏书风气。据文献记载，从汉代开始，江南地区就开始有藏书的记载。到明代，江南地区的藏书家更多。以浙江为例，据吴晗的《江浙藏书家史略》统计，共有藏书家 399 人，晋代 2 人、南朝梁 2 人、南北宋 33 人、元 15 人、明 80 人、清 267 人，明代占到五分之一。四是江南地区刻书业发达。明

代江南地区的图书印刷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明人胡应麟曾说：“余所见当今刻书，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繁盛的刻书业为藏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三、形成了各自的藏书特色

明代的私人藏书家各自有自己的藏书重点，他们往往就自己感兴趣的图书进行收藏，客观上起到了保存文化的作用。如范钦的天一阁原藏中，明代的地方志、科举录、内部官书文件占了特殊重要的地位。据骆兆平先生统计，范钦当时收集的明代地方志达435种，比《明史·艺文志》中著录的还要多。天一阁现存的271种明代地方志，海内孤本占到164种（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述略》）。天一阁收藏了大量明代的科举录。其中有明代首科洪武四年（1371）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又有极为罕见的建文二年（1400）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虽然天一阁的科举录有所散失，但现存的370种明代科举录，占全国现存明代科举录总数的80%，其中90%以上为海内孤本（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述略》）。范钦还喜欢收集内部官书文件。这些一般藏书家不注意且不喜欢收集的文件，成为研究明代社会史的最有价值的文献。祁承燾认为：“凡涉国朝典故者，不特小史宜收，即有街谈巷议，亦当尽采。”因此，澹生堂收录了一般人不重视的地方文献、戏曲、小说等书籍。华夏的真赏斋以三代鼎彝、魏晋以来金石缣素、法书名帖、宋元精善图籍为收藏重点，品位很高。

范大澈喜欢收集秦汉以来的印章,《鄞县志》记载其数量达5 000枚之多,如记录可靠,则他是明代收集古印最多的人。

四、重视藏书的利用

明代的一些著名藏书家不为藏书而藏书。他们将图书的收藏与学术研究、刻书活动相结合,通过阅读藏书促进自己学识的提高,通过刻书扩大书籍的流传范围。如东里草堂主人杨士奇曾说:“积书岂徒以侈座隅、充篋笥而已?必将讲读究明务得之于心,而行之于身也。”(《东里续集》卷十四)强调藏书供读书、著述之用。杨士奇之所以有《东里文集》25卷、《东里诗集》3卷、《东里续集》62卷、《东里别集》3卷,跟其丰富的藏书是分不开的。妙赏楼主人高濂同样有这样的认识。他说,藏书应“无问册帙美恶,意惟欲搜奇索隐,得古人一言一行之秘,以广心胸”。他批评某些藏书家“不乐读诵,务得善本,绫绮装饰,置之华斋,以具观美”,结果“尘积盈寸,经年不识主人一面,何益哉?”他自己对藏书“类聚门分,时乎开函摊几,俾长日深更,沉潜玩索,恍对圣贤面谈,千古悦心快目,何乐可胜?古云开卷有益,岂欺我哉!不学无术,深可耻也!”(《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正是通过读书,高濂创作了《节孝记》、《玉簪记》等戏曲,成为明代著名的戏剧家。谢肇淛同样认为藏书是为了“明义理”、“资学问”,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他还批评了“浮慕时名,徒为架上观美”的“谓之无书”型藏书家,“广收远括,毕尽心力,但图多蓄”,但“不事讨论”、“半束高阁”的“书肆”型藏书家和“博学多识”、“记诵如流”,但“难以自运”、“寸觚莫展”的

藏书家（《五杂俎·事部一》）。正是在为藏而用的指导思想下，明代藏书家中才涌现了宋濂、王世贞、胡应麟、郎瑛等大学问家。

明代的私人藏书家还致力于刻书事业。毛晋不像别的藏书家为藏书而藏书，一获善本便秘不示人，而是获得善本便刊刻，以广流传。毛晋所刻之书，底本好，校雠精，具有较高的质量。当时有“君获奇书好示人，鸡林（朝鲜古国名）巨贾争摹印”（吴伟业《汲古阁歌》）之说。清代学者朱彝尊也说，毛晋“力搜秘册，经史而外，百家九流，下至传奇小说，广为镂版，由是毛氏钞本走天下”（《严孺人墓志铭》）。袁褰、王鏊、赵琦美等藏书家同样有刻书的善举。

五、重视藏书的整理

明代的藏书家对所收藏的图书或进行校勘，比较异同，补充得失，或编定目录，以利保存。赵琦美曾得到李诚的《营造法式》一书残本，他遍访藏书家，又借出文渊阁本作参考，前后校勘达20年之久，才将全书完成。李如一同样如此。钱谦益说他“阙必补，讹必正，同异必校勘”（《李贯之先生墓志铭》）。为了便于图书的保管，明代的私人藏书家还大力编制书目。据汪辟疆先生的《目录学研究》统计，明代私人藏书家编制的书目达41种，有20种流传到今天（《目录学研究》）。朱睦㮮的《万卷堂书目》、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祁承燦的《澹生堂藏书目》等一直受到后世学者称赞。而祁承燦在编制书目过程中提出的“因”、“益”、“互”、“通”理论，尤其是他的“通”（主张将丛书、文集集中的单部书分析出来，分别著录于各部之下，以便按类求书）与“互”（将涉及两类和两类以上的书同时著录于这些不同类目中，便

于读者查找和检索)的理论,大大提高了书目的实用价值,实为清代章学诚的“别裁”与“互著”的先声,并一直影响到今天。

六、重视藏书保护

我国古代书籍屡遭磨难,除政治、战争的原因难以避免外,自然条件对书籍的毁灭和损害是可以避免的。明代的公私藏书家吸取了以前的经验与教训,对藏书的自然条件进行研究,并得以实施,许多藏书藉此得到很好的保护。

首先,注意对藏书楼构造的研究。藏书楼的构造是对其藏书保护的基础条件。书怕火的道理是最明显的,古代有所谓“金匱”、“石室”,显然是为了防火的,但是传说还是确有其物不得而知。而明代为贮藏历代的《宝训》、《实录》而在北京宫内修建的皇史宬,则确实堪称为金匱、石室,保存图书效果良好,起到了防火、防潮、防热的作用。私人藏书楼建造最理想的当数天一阁。阁前开凿水池,以防火灾,建筑原理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虽有些近于迷信,但起码说明范钦考虑到了防火的因素。胡应麟的二酉山房建造亦有特色,“凡两楹,上固而下隆其址,使辟湿而四敞之可就日”(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显然是为了防潮、防虫蛀。总之,明代的公私藏书楼的建筑有许多是对藏书条件进行研究的结果。

其次,注意对防蛀的研究。我国古代的书籍因纸张的原因,容易发生虫蛀。为了防止虫蛀,古人总结出一种有效的方法——曝书,即在一定的季节晒书。明代藏书家们对防蛀的研究也大大前进了一步。谢肇淛认为:“书中蠹蛀,无物可辟,惟逐日翻阅而已。置顿之处,要

通风日，而装潢最忌糊浆后裱之物。宋书多不蛀者，以水裱也。日晒火焙固佳，然必须阴冷而后可入笥，若热而藏之，反滋蠹也。”（《五杂俎》卷九）毛晋对书籍装裱更有研究，“用伏天糊裱，厚衬料，压平伏。裱面用洒金墨笺或石青、石绿、棕色、紫笺俱妙。内用科举连裱里，糊用小粉、川椒、白矾、百部草细末，庶可免蛀”（孙从添《藏书纪要·装订》）。而天一阁防潮防蛀更有新法，在书柜下面放置英石，用以吸潮；在书中夹芸草，用以防蛀。

七、藏书理论有所突破

明代的私人藏书家，在致力于藏书实践的同时，注意从理论上对藏书活动进行归纳和总结。如祁承燦在长期的藏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在《澹生堂藏书约》中的《藏书训略》中对如何收集、鉴别图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祁氏认为，购书时“眼界欲宽”（要有大视野）、“精神欲注”（选书时要专心）、“心思欲巧”（多动脑筋、多想办法收集图书）；在鉴别图书时要“审轻重”（按书的内容和成书时间的先后区别先后次序）、“辨真伪”（要注意辨别书的真假）、“核明实”（对书的实际情况进行考证，不被表面现象迷惑）、“权缓急”（按照经世致用的原则，对各类图书给予不同的重视）、“别品类”（注意图书的分类编目），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明代的私人藏书家还开始对私人藏书活动进行分类与总结。胡应麟曾将藏书家分成这样两类：“列架连窗，牙标锦轴，务为观美，触手如新，好事家类也；枕席经史，沉湎青箱，却扫闭关，蠹鱼岁月，鉴赏家类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一）清代学者洪亮吉将所有藏书家分为考订、校讎、收藏、赏鉴、掠贩五类，近代学者叶德辉将藏书家分为著述、校勘、收藏、赏鉴四类，都

受到了胡应麟分类的启迪。

历代的私人藏书家都将藏书当做私有财产。明代的一些藏书家也不例外。如叶盛的书橱上便有“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转引自杨立诚《中国藏书家考略》）的话，不让外人借阅。但同时，明代的一些私人藏书家已开始提出图书的共读和流通思想。李如一将他的藏书楼命名为“共读楼”，寄含“天下好书，当天下人共之”（钱谦益《牧斋有学集·李贯之先生墓志铭》）的理想，并允许普通图书外借。徐燊的“红雨楼”虽不外借，但允许别人来阅读。他认为：“贤哲著述，以俟知矣。其人以借书来，是与书相知也；与书相知者，则亦与吾相知矣，何可不借？”（《笔精·借书》）更重要的是曹溶写于崇祯年间的《流通古书约》：“彼此藏书家，各就观目录，标出所缺者，先经注，次史逸，次文集，次杂说，视所著门类同，时代先后同，卷帙多寡同，约定有无相易，则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二月间，各贲所抄互换。此法有数善：好书不出户庭也；有功于古人也；己所藏日以富也；楚南燕北皆可行也。”这种方法为财力不济的藏书家提供了一个增加收藏的好办法；至于有财力的藏书家，可以“节燕游玩诸费，可以成就古人，与之续命，出未经刊布者，寿之枣梨……”（转引自《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曹溶的这一藏书思想对后代有很大影响。如丁雄飞、黄虞稷的《古欢社约》便是与曹溶的《流通古书约》一脉相承的。

八、注重宋元版的收藏，研究鉴定版本的方法

明代中期掀起了一股在文风上的复古运动，极大地影响了出版事业和藏书事业。出版事业出现了翻刻宋元版书的风气，藏书事业出现了收藏宋版书的热潮。宋版书年

代较久,存世日少,文物价值增高,同时文字上差错较少,所以备受藏书家的青睐,争相收藏。这就使宋版书的价格不断上涨,如毛晋购买宋版书已以页论价,极大地刺激了书贾中的射利之徒。社会上的宋元版书毕竟有限,于是书贾们便想尽了种种方法制造假宋版。藏书家开始对造伪现象进行研究,高濂在《遵生八笺》卷十四《论藏书》中论述道:“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模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褙方帘绵纸,或用孩儿白鹿纸,筒卷用槌细细敲过,名之曰刮,以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将新刻板中残缺一二要处;或湿霉三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妆茅损,用沙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薰黄,俨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锥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纸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腻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旧者。或札夥囤,令人先声指为故某家某姓所遗。百计瞞人,莫可窥测。多混名家收藏者,当具真眼辨证。”藏书家要收藏宋版书,必须具有识破书贾造伪的能力,必须掌握版本鉴定的方法。明代许多藏书家是长于此道的,如文徵明的三个儿子文彭、文嘉、文伯及胡应麟、高濂等都精于版本鉴定。正是由于藏书家们研究版本,促进了版本学的发展,使明代中期以后的版本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节 明代的官府藏书

有明一代的中央政府非常重视文化建设,一方面

大量编纂刊刻各种书籍，一方面广泛搜求各类图书，藏于中央政府的有关机构，使得明代的官府藏书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

一、明代官府藏书的建立和充实

1. 接收前朝遗书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上承历代统治者在建元之初访求图书的优良传统。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兴师北伐。八月，大将军徐达攻入元都北京后，即封闭元宫廷府库图籍宝物，严守宫门，禁止士卒侵暴，从而将曾经接收过宋金遗书的奎章阁、崇文院和秘书监等元代重要藏书机构所藏的图书、祭器、仪象、版籍等物品统统承袭下来，全部收归本朝所有，尽数载运金陵（南京）。书籍部分多是宋元刻本及旧抄，此举使明朝皇室藏书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2. 广泛收集民间图书

明初太祖一朝，据《明史》、《明会要》等书的记载，早在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六月，朱元璋领导农民起义军激烈反抗元朝统治时，就曾命令部下访求古今图籍，以充秘府之藏；在攻克集庆（今南京）时，又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由于政府的鼓励，百姓中之好书者，皆乐于献上。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当时的福建布政司呈进的书籍有《南唐书》、《金史》、《苏辙古文》等三种，即是一例。

建文即位后，继续搜购遗书。同时，朝廷还派遣专使往各地求书。在求书工作中，有严格的赏罚标准，对撰著进献“有补政治”书籍者，赐金币，晋以官职；对无补于世道人心的道家炼丹之类，却而不纳；而对那些妖言惑众，期冀富贵持献所谓“天书”的妄人，则杀头

问斩，以杜流弊。

成祖初年，《永乐大典》开始编纂，当时南京文渊阁的藏书情况是“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遂召礼部尚书郑赐，令其派人四出购求遗书，并且要求：书籍不可较其价值，惟其所欲与之。不再限于以前的支绢、给钱、补官等旧有成法，凡朝廷所需要的书籍，悉数购回。于是，征购各种图书达七八千种之多，明代的政府藏书遂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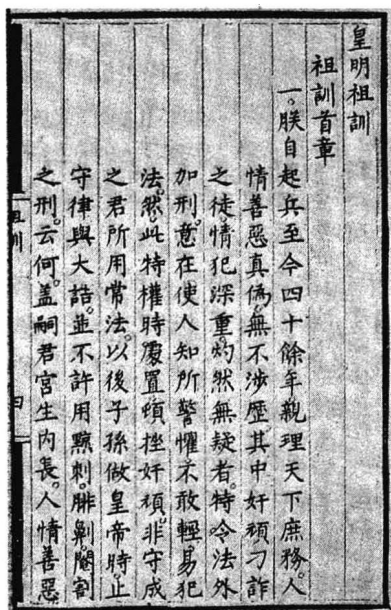
仁宗、宣宗时期，继续发展皇室藏书事业。尤其是宣宗，善诗文和绘画，时而临视文渊阁，命典籍官取经史之书披阅，与杨士奇等讨论，询以时政，并与之吟诗。在位期间，曾几次搜求民间遗书。经过六七十年的努力，藏书约两万余部，近百万卷。其中，“刻本十三，抄本十七”，达到有明一代之顶峰。

嘉靖十五年（1536），御史徐九皋核查历代《艺文志》，遇有不全之书，往士民家中寻借，待官府誊录完毕，再发还原处。世宗还敕命将历代《艺文志》所载之遗书及明朝名臣之文集，凡有补于世教者，一并收贮。

3. 本朝撰述的入藏

明代内府设有专门的刻书机构，刻印书籍的内容大多是政令典制和经史读物，主要供宫内学习、颁赐群臣、学校等用途，这些书籍又成为官府藏书的重要来源之一。

明代的内府刻书的主要机构由司礼监主持，下设经厂，专司刻书。嘉靖时，司礼监所属的刊字匠、刷印匠和黑墨匠就达600余人，规模很大。刻书内容以推行文治政教为主，包括典章制度、史籍和鉴戒之书等，如洪武刻本《御制大诰》、《大明集礼》、《祖训录》、《存心



明内府藏《皇明祖训》

明内府刻本

录》、《臣戒录》、《志戒录》、《诏鉴录》等；永乐刻本《历代名臣奏议》、《古今列女传》等；景泰至崇祯时有《历代君鉴》、《历代臣鉴》、《外戚事鉴》、《大明集礼》、《帝鉴图说》和《崇祯历书》等等。据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所载，刻书达154种。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由内府主持刊刻的洪武《大藏》、永乐《北藏》、正统《道藏》等宏篇巨帙。

经厂和南、北国子监，在当时并称为三大刻书中心。国子监是明代中央官学，永乐以后有南、北之分，一在应天府（南京）；一在顺天府（北京）。南京国子监的刻书，一是修补缺损书版。南监的书版在元代就曾修补过，入明以后又多次修补。洪武十四年（1381），太祖以国子监书版岁久残剥，命诸儒考补，督匠修治。赵俊奉诏监理，古籍始备。洪武二十八年（1395），又校正经书刻版，印行于天下学校。此类版本称为“南监本”；迭经宋、元、明三代修补者，称为“三朝本”；因部分书版漫漶不清，以之印出的书又称“大花脸本”。南监以补版刻行的书籍内容以历代正史和典制书籍为主，如三朝本《十七史》和《文献通考》等书；二是自刻御制书及经史子

集诸书。

北京国子监的刻书事业，自成祖迁京后兴起，万历以后进入盛期而逐渐取代南监的刻书地位。主要是依据南监的书版重刻了一些书籍，如《十三经注疏》、《廿一史》，还有《四书集义》、《临川文集》、《国子监志》等，数量不多，有40余种。

此外，各府部院等衙门也纂刻了一些书籍，据《古今书刻》、《明代敕撰书考》等书记载，有礼部、兵部、工部、都察院、钦天监、太医院、隆福寺及南京提学察院、詹事府、秘书监、南京礼部、吏部及太常寺等。如礼部刻有《大礼集义》、《历科会试录》等；都察院刻有《史记》、《文选》、《三国志演义》等书30余种；钦天监印造的、颁赐于各机构的《大统历》，在宣德年间竟达到几十万册之多，可见当时刻书之普遍。各藩府诸王也雅好文事，编刊了一些书籍，如被誉为16世纪末最卓越的数学家和音乐理论家的朱载堉，他是朱厚烷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的第六代孙，其著作内容题材广泛，多是有关数学、历法、音乐方面的科技书籍。

明成祖时，为了笼络学界宿儒为新政权服务，也为了粉饰太平，决定编纂一部超越前代的大型类书，于是动用2 169人、花费六年时间修纂了《永乐大典》，这是未曾发刻、仅有写本和抄本的巨帙。全书22 877卷，目录60卷，辑入书籍7 000~8 000种，约3.7亿字，装成11 095册。

所有这些，多是以文渊阁等官方藏书为基础编成的，而它们的纂成，反过来又大大丰富了明代皇室的藏书。

二、明代主要官府藏书机构

明代的官府藏书，可分为宫廷藏书、出版和教育机构藏书及官署藏书。宫廷藏书如大本堂、东阁、华盖殿、